

美国学院文学批评再反思： 从梭罗到萨义德

周郁蓓 著

外国文学研究丛书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美国学院文学批评再反思： 从梭罗到萨义德

周郁蓓 著



外国文学研究丛书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学院文学批评再反思:从梭罗到萨义德/周郁蓓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5615-5407-4

I. ①美… II. ①周… III. ①文学评论-美国-近现代

IV. ①I71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9063 号

官方合作网络销售商: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总 编 办 电 话:0592-2182177 传 真:0592-2181253

营销中心电话:0592-2184458 传 真:0592-2181365

网址:<http://www.xmupress.com>

邮箱:xmup @ xmupress.com

厦门市明亮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7 插页:2

字数:160 千字

定价:3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梭罗的道德观	10
第二章 通才与专才之争:学院文学批评的平庸化	99
第三章 从劳伦斯看美国文学批评:学院文学批评的工具化	126
第四章 萨义德的民主批评:梭罗的回归?	157
参考文献	211

绪 论

本书不是一本单纯的理论著作,也不是对美国文学批评全面而综合的历史叙述或介绍性研究。本书的主题是美国文学批评,或美国学院文学批评。但本书采取以点见面的方式阐述美国文学批评的得与失。这些点包括梭罗的《瓦尔登湖》、通才与专才之争、美国文学批评与劳伦斯的《美国经典文学研究》、萨义德的人文批评观等。很显然,梭罗批评不属于任何范畴、任何定义上的美国文学批评。这些点之间似乎也不存在明显的关联性。甚至美国文学批评也具有模糊性,既可指关于美国文学的批评,又可指美国的文学批评。正因为如此,本书用“另一只眼”看美国文学批评。在“另一只眼”的视角中,这些看似并不关联的点,不仅有了关联,还可互相说明、互相评价。在“另一只眼”的视角中,美国文学批评的两个意义可同时存在,关于美国文学的批评就存在于美国的文学批评之中,后者所具有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前者所具有的特征。这些关联和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于章节之间,也存在于每章之中,因为本书用“另一只眼”所关注到的是文学批评的思想特征、方法特征、语言特征和道德内涵。尽管本书所指的文学批评为学院文学批评,但本书不是一部论述方法论的著作。

本书的主旨是美国文学批评的思想特征、方法特征、语言特征以及道德特征。但这些并非毫无瓜葛,道德动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思想特征、方法特征和语言特征,后者也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道德意志、影响道德意志、代表道德意图、甚至决定道德意图。

本书如若以方法论为出发点，就不可能把梭罗作为研究对象。从文学批评的字面意义和规定意义而言，梭罗的《瓦尔登湖》肯定不是美国文学批评著作。但当观察的视角超越了字面意义和规定意义时，梭罗和美国文学批评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便显现出来。一方面，从 20 世纪初梭罗的作品成为美国经典作品以来，梭罗一直是备受美国文学批评界关注的美国作家之一。梭罗的代表作如《瓦尔登湖》等，因为具有反类别特征，既是以特立独行而表征了美国自由的美国作品，又是以独树一帜而挑战了既有文学观的美国作品。因此，梭罗首先以美国文学批评研究对象的身份与美国文学批评产生了必不可少的关系。另一方面，梭罗是美国文化和思想史上最为独特的一章，他并不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开拓者，却既表达了美国反叛权威的革命价值观和追求自由的民主价值观，又表达了与美国的物质利益观和工具价值观截然不同的精神价值观。既然美国文学批评是美国思想文化的行为者、阐释者和代言者，代表了美国思想文化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动机，也不断成为其他美国文化阐释者的语境，美国文学批评便间接地与梭罗构成了必不可少的关系。此外，在《瓦尔登湖》中，梭罗将自己定位为认知者、阐释者和写作者——认知和阐释自我、他人以及自然，从这个意义上讲，《瓦尔登湖》本身就是一部比喻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之作。本书之所以以梭罗为起始，皆因为梭罗与美国文学批评这种无可剥离的复杂关系。由此，本书所思考和回答的问题便包括：梭罗的《瓦尔登湖》究竟针对怎样的美国现实？梭罗对美国思想文化中的哪些价值观做了既借用又转义式的批判和传承？梭罗对它们既借用又转义的

原因是什么？梭罗将这些价值观转义为了怎样的价值观？梭罗如何为认知这种价值观构建了一个有益的语境？梭罗通过怎样的行为与语言实践阐释了这样的价值观？梭罗践行自己价值观的最终动机是什么？

通过对所有这些问题的探索，本书旨在阐明梭罗在《瓦尔登湖》中作为一个阐释者、阅读者、写作者和生活者的四重实践，阐明梭罗如何将四种实践汇聚在同时关照自我、关照邻人、关照自然的认知观和道德观中，汇聚在毫无功利、毫无物欲的精神性动机和劝谕动机中。他在这自然的语境中进行阅读、写作和生活的过程，是认知和实践的过程。而这个认知和实践的过程由于没有重复自我中心主义的逻辑，也没有重蹈工具理性主义的覆辙，因此成功赋予了挪借于美国政治的自由、民主和幸福等概念以道德含义和道德动机。由于梭罗的角色和行为同样是阐释、阅读和写作，梭罗还通过回归自然的生活，剥去了阐释、阅读和写作的惯常意义和体制意义。梭罗的《瓦尔登湖》对 20 世纪中期以来的学者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后者的学术性批评与《瓦尔登湖》的距离并非时间上的距离，而是道德和精神境界上的距离，是动机上的距离。因此，当学者们试图将梭罗格式化，并以此为基础贬低或赞扬梭罗时，梭罗与美国文学批评之间便构成了切实的反讽关系。本书的第一章从美国文学批评对梭罗的接受方式说起，正是要凸显这样一种关系。但本书并不打算以阐述这种关系的方式贯穿美国文学批评的主题，而是选择以阐述和分析梭罗的《瓦尔登湖》的方式，将梭罗留在前景之中，将美国文学批评的主题留在后景之中，打破时间框架，让后景中的美国文学批评，即研究梭罗的美国文学批评，成为梭罗认知和实践起始的场景，成为梭罗逐渐离开从而走向另一个场景，即自然场景

的场景，也成为梭罗最终回来进行劝谕的场景。但是，这个背景中并不只有当代梭罗批评。本书从当代梭罗批评起始后，采用了一个从当代逆回到梭罗时代的美国的轨迹。那么，在这个背景中，就不仅有当代梭罗批评，也有梭罗时代的美国。将两者置于同一个背景中的目的，是要展示两者的共性，是要使这个背景更加庞大，并利用这个背景。如果说《瓦尔登湖》起始于对同时代思想文化的批判性和解决性解读，那么它便合情合理地是当代梭罗批评的批判性和解决性解读。

但从时间上而言，本书是以议论当代梭罗批评开始的，对美国思想文化的讨论发生在这之后，在对梭罗的细解之前。顺序的倒置表明，当代梭罗批评的问题已经暗含在了梭罗同时代的美国思想文化之中。如此，梭罗与美国思想文化的断裂至今未能修复。梭罗是19世纪美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作为一个自由思想者，同时也是一个身体力行者，梭罗在美国思想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作为一个遵循自由模式的写作者，在美国文学史上同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断裂使得梭罗的重要性愈发显要。为了彰显梭罗的重要性，或者说已经缺失了的重要性，本书并不遵循章节之间需保持平衡的原则，而是给予了梭罗以最大的篇幅。与第一章乃至第四章相比，中间两章相对短小。本书拟通过这种短小，让美国文学批评与梭罗形成反差，也让美国文学批评自身的产量与其产品的价值形成反差。

由于当代梭罗批评并非出自梭罗，而是出自19世纪的美国思想文化，本书选择了两个主题代表19世纪的美国思想文化逐渐发展至当代梭罗批评的过程，即通才与专才之争、美国文学批评的国族动因和学科动因。以此为题的两章和第四章的主体，都曾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本书对三篇原文都做了相应的补充和

修改。第四章对原文有较大篇幅的补充和修改。第一章直接跨过了梭罗和当代批评之间的时间间距,并将时间顺序倒转过来,让梭罗成为对当代批评的点评,因为历史的前行并不意味着所有意义上的进步。但是,在第一章到第四章之间,本书仍然因循了时间顺序,除旨在勾勒美国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外,也拟思考以下问题:当本应持存的东西被人以人为的方式逐步卑微化,乃至最终接近消解时,当重拾这些东西的艰难显而易见时,重拾是否可能?怎样重拾?第二章对美国文学批评学科化之后出现的第一波论争也即通才与专才的论争做了评述与分析。从表面上看,通才学者们反对文学批评专业化、帮助大众学会和享受阅读的理由,与梭罗的理念有几分相仿,但通才学者们不断在学院和媒体之间周旋,最终从学院走向媒体。这一事实表明,他们的理念是梭罗所批判的美国思想文化本质和行为的延续,他们已经比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嘲讽的哲学教授更加平庸。

第三章阐述了在美国文学批评走上专业化道路后一直赋予其价值、促进其发展的两个重要动因:国族动因和学科动因。但这一章并不对这两个动因进行纯理论阐述,而是同样采用了以文本分析为主、以理论分析为辅的方法,对20世纪中期前后美国文学批评的著名论著进行解读,以期彰显其背后的两个动因。另外,这一章并不就美国文学批评而论美国文学批评,或者由某个理论预设出发而分析美国文学批评,而是从劳伦斯的《美国经典文学研究》一书入手展开讨论。劳伦斯的《美国经典文学研究》并不是一部学术著作,也不是一部立意宏大的巨著,只是一本抒发个人感受、表达个人愿望、充满灵感和情绪的书。但美国文学批评却自愿成为了这本小书的受启者,借这本小书的灵感成就了一批重要的美国文学批评论著。在《美国经典文学研究》

中,美国主题只是劳伦斯表达自我的媒介,因此,贯穿全书的主线——美国双重性,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被视为是对美国现实的写实描写。但是,恰恰是这种美国双重性成为了美国文学批评反复演绎的母题。不仅如此,美国文学研究者们还通过相互对话、相互补充、相互解释、相互作为场景的方式,以这个母题为主导逐渐形成了服务于这个母题的体制化批评思路、批评方法和批评语言。这个过程满足了美国文学批评在美国文学中寻找国族价值,并通过将其体制化和方法化的方式,满足了文学批评作为一门大学研究型学科必须具有实用价值和专业价值的双重要求。劳伦斯以小见长的著作与美国文学批评形成了三个反差:小书的“小”与批评论著的“众”之间的反差,小书的随性和个性与批评论著的千篇一律之间的反差,小说的欧洲背景与批评论著所坚持的美国性之间的反差。这个由小而大的过程,与梭罗由大而小的道德认知过程截然相反,是“消散型回应”,也是一种“狂热型回应”。前者满足于抓住任何可用机会而大做文章,后者则将一个动机术语强加于所有。^① 本书由劳伦斯出发,展现了这样一个事实:所取用的源头、所言说的对象,并不等于取用者的动机,就像梭罗的思想不是梭罗批评的动机一样。当然,劳伦斯的《美国经典文学研究》之所以可以被美国文学批评所取用,是因为劳伦斯的著作中显而易见的自我表达本质,劳伦斯的英国著名作家身份,可以转而服务于美国文学批评最为根本但却秘而不宣的动机:一种基于先天不足(作为研究型学科、作为美国文学的研究者)的自卑感之上的、基于作为美国人的自豪感

^① Burke, Kenneth. *A Grammar of Motiv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442.

之上的本我满足与自我确证。当然,美国文学批评的自我,已经是劳伦斯自我的扭曲和滥用,是用工具理性强化了自我。而美国文学批评从劳伦斯处寻得的但不愿承认的最深层次的东西,是欧洲父亲的庇护和肯定,一种对自我的间接弘扬。

第四章之所以以萨义德为题,是因为萨义德以另类的方式,对国族、学科以及自我的主题进行了转义性和反讽性延伸,同时还因为萨义德与梭罗一样,也是一个有着主流和边缘双重身份的美国人,是一个既被褒又被贬的学者。本书不是对萨义德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研究,也不从后殖民主义视角研究萨义德。相反,萨义德对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嘲讽,是本书的切入点。从这一切切入点起始,本书拟显现后殖民主义研究或萨义德研究与当代梭罗研究的共性。在第三章中,本书已经阐明,美国文学批评体制不断庞大,约束性不断加强,文献体系不断膨胀,自我对话性要求不断严苛,声称有目的但实际无目的,声称有价值但实际无价值的现象也愈发严重。所有这些结果,早已包含在梭罗所批判过的 19 世纪的美国文化之中,而且是后者的延续、发展和巩固。因此,梭罗便不仅对当代梭罗批评构成了反讽,也对萨义德研究构成了反讽,或者说对当代文学批评构成了反讽。但是,本书借萨义德一章所提出的问题是,在当代的学术场景中研究和写作,像梭罗那样走入自然的可能性愈发微乎其微,那么,到底这种可能性还存在否?实现这种可能性是否可能?实现的方法是什么?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萨义德在《起始》中所提出、探讨和尝试解决的问题。如果说梭罗所做、所言因其普遍性意义而适用于讨论当代学术问题的话,那么萨义德则是典型的时代产物,他所针对的也是演进到 20 世纪后半期时的典型学术困境。因此,萨义德通过提出起始的问题而尝试突破此困境的方法,对

于具有道德意识的学者而言便具有了较为重要的参考意义。

梭罗所批判了的现象在当代批评中演变到了极端。对于大多数批评而言，文本到底说了什么、到底用了怎样的方法来说、为了达到怎样的目的、具有怎样的起始动机，其实无关紧要。具有至高重要性的是自我，是预设，是证明自我，证明预设。文本在批评者的自我和规定的方法与思路面前往往退居其次。由于有自我作祟，层层预设其实并非由原初的思想家本人所设置或建构而成，而是思想家们的学院追随者们所为。为此，就像梭罗回到自然一样，萨义德的《东方学》抛开所有中介和对话，直接与现象的源头即“东方学”的原文本接触，《起始》则直接回到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的文本本身，从思想家处寻找起始之意义、起始之动机和起始之方法。《东方学》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萨义德对起始有了正确的认识。《东方学》是对起始的实验性尝试。为此，对于文学批评家而言，萨义德的真正重要性，并不在于他关于东方学的认识本身，而在于他与梭罗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写作和生活具有共性的批评方法、批评主题和写作形式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意义和意图。

本书在讨论萨义德时，同样做了一个打破时间顺序的安排，将对《东方学》的讨论置于对《起始》的讨论之前。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其一，同梭罗与当代梭罗批评的关系一样，萨义德也与萨义德研究构成了一个反讽关系。这一章以萨义德研究起始，除彰显这种关系之外，还拟通过对《东方学》的分析，展现萨义德所揭示的真相：东方学著作的动机、目的、方法和语言背后的思维方式、思想原因，与萨义德研究如出一辙；萨义德研究不是萨义德《东方学》的延续或扩展，而是东方学的延续。萨义德与其他研究者的最大不同，便是他在认识到东方学思维误区和思想

误区,认识到由此所导致的方法误区和语言困境时,选择用决不重复这些误区的方式来研究、写作和阐述。当这些关系和事实较为明晰时,起始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其二,本书通过先看结果和事实、后究原因的方式,重复萨义德在《起始》中打破时间顺序时所表现出来的道德自律性:萨义德将维科置于最后一章讨论。这种安排让思考回逆,其目的是让自己在此过程中强化有关起始和结果的意识。萨义德的所有著作都表明,批评的动机和目的决定批评的方法和语言,起始是否成功,关键在于动机中是否有道德性和责任性。本书所要考量的正是包含了道德动机的批评方法和批评语言。如果说梭罗的写作方法、写作语言和生活方式都是对一种道德动机的贯彻,因而表达着独特意义的话,那么,批评方法和批评语言同样应该如此。但是,萨义德毕竟不是梭罗,因为已经不再有自然供他回归。他的局限之处有待读者点评。本书归根结底是一本关于道德的书。

第一章 梭罗的道德观

梭罗的著作素以难以归类、难以摘要著称。从《在康科德与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到《瓦尔登湖》再到《论公民的不服从》，从体裁到风格再到主题，莫不如此。梭罗坚信，最优秀的艺术作品，无不“表现人将自己从[工具的工具]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奋斗历程”。^① 以此标准衡量，难以归类和难以摘要恰是优秀作品的必备品质。然而，20 世纪中期以来，美国的主流梭罗研究，却常与梭罗的信念相悖而行，不仅变自身为方法和概念之工具，也将不拘一格的梭罗变成了学术工具之工具。学者笔下的梭罗形象，先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前后的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浪

^① Thoreau, Henry David. *Walden and Resistance to Civil Disobedienc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2. 25.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在括号内标出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行作注。

漫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①变成了 70 年代的道德楷模。^② 80 年代开始,梭罗又成为后现代理论追捧者的宠儿,成为当代批评提取理论同位元素的有效材料。此时的梭罗,挪用大众文化,戏仿商业话语,表演语言狂欢,^③著就了一部催人向上的劝谕书,一部将企业精神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政治科学著作,一场表演良心的政治盛宴。^④

表面呈繁荣和多元之势的美国主流梭罗研究,在一定程度

① 如 Morton White 和 Lucia White 将梭罗视为辱没乡村生活、远离社会关系的消极抵抗者。见两人的论著: *The Intellectual Versus the City: From Thomas Jefferson to Frank Lloyd Wright*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2. 41.)。Sherman Paul 的 *The Shores of Americ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8) 将梭罗定义为个人主义者, Richard Drinnon 则认为梭罗是无政府主义者, 见 *Thoreau's Politics of the Upright Man*. *Massachusetts Review* 3(1962): 126-38.

② 如 Bob Pepperman Taylor 在 *America's Bachelor Uncle: Thoreau and the American Polity* 中指出,梭罗以反资本主义姿态示人,而其主题却是道德改革。Stanley Cavell 则将《瓦尔登湖》视为美国的俗世圣经。见 *The Senses of Walden: An Expanded E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③ Malini Schueller 运用巴赫金的理论解读梭罗,见“Carnival Rhetoric and Extra-Vagance in Thoreau's Waldern.” *American Literature* 58.1(1986): 33-45.

④ Brian Walker 在“Thoreau's Alternative Economics: Work, Liberty, and Democratic Cultivation”中指出,《瓦尔登湖》是一部面向普通劳动者并探讨其在为生计而老的同时获得自由之策略的劝谕书,该文载于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2. 4(1998): 845-56. Philip Abbott 认为,《瓦尔登湖》“既净化又信奉资产阶级价值观”,“将拥有权所带来的自傲与原始生活的传奇结合起来”,见“Henry David Thoreau, the State of Nature, and the Redemption of Liberalism.”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47. 1(1985): 184, 197. 最后一个主题参见 Turner, Jack. “Performing Conscience: Thoreau, Political Action, and the Plea for John Brown.” *Political Theory* 33. 4(2005): 448-71.

上,是单一“公理体系”的反复演绎:一方面用该体系满足方法论需要、说明批评整体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由该体系衍生出无需论证、不言自明的“参照体系”。^① 主流梭罗批评因此而呈现出两个悖论:批评与批评对象之间的悖论;方法、概念、理路等的同一性和同质性与其所论证的自由、戏仿、狂欢等主题的特异性和异质性之间的悖论。当代主流梭罗批评的误区,可以说是列奥·施特劳斯所说的由历史主义、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所导致的极端相对主义之谬,^②也可以说是海登·怀特所说的将模拟现实钦定为所有话语之标准的话语理念之误,或者可以说是拉塞尔·雅各比所说的真正的激进主义和乌托邦理想的丧失。相对主义既以真理的不再为前提,也导致真理的不再,陷学术于无良目标的道德危机之中。话语理念之误,如怀特所释,陷话语者于概念或体制的操控之中,使之无法企及既处于诠释状态又处于“前诠释”状态、既批评他者又批评自我的认知道德境界,无法“在关乎诠释之本质的同时关乎主题,使主题成为自身构建行为的显性契机”。^③ 乌托邦理想的丧失使得政治和学术都将激进主义化约为了手段和方法,既不能超越市场主义,也不能迈出政治提案式的公民参与,造就了鼠目寸光的知识分子。^④ 主流梭

① 可见 Adorno, Theodor W. *Notes to Literature*. Vol. 1, Trans.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9. 15-16.

② 参见 Strauss, Leo.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Other Studi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9.

③ White, Hayden. *Tropics of Discours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White, Hayden. Press, 1978. 4.

④ 拉塞尔·雅各比:《乌托邦之死》,姚建彬译,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1 页。

罗批评,就像爱德华·凯西所说的被“实证主义、新实证主义、维根斯坦、奥斯汀”哲学或“存在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海德格尔、德里达”等概念所取代了的美国哲学一样,让探求思想的智识生活,同化为维护和维持人所设定的认知方式和制度标准的工具。^①表面上看,主流梭罗批评的误区,似乎是技术和方法的误区。但是,当批评自身既是批评的终极目标,又是其存在的合理性时,换言之,当批评以无理性基础的职业信仰证明方法的理性主义,以无现实依托的职业化思想论说现实时,技术和方法上的误区在本质上就是智识被奴役、美学意识被剥夺的“集体道德怯懦”,^②也使梭罗研究成为自身研究对象也即梭罗的嘲讽对象。

这样的道德怯懦,常使梭罗在被冠以“美国思想之代表”的同时,又被排斥在正统的美国思想谱系之外。例如,在研究美国实用主义思想谱系时,康乃尔·韦斯特对美国实用主义思想家作了如下定义:“规避”欧洲认识论,“挑战学科分类”,以“处于困惑之中的老百姓”为言说对象,“将知识寄托于力量、传统于创造、授业于激励、社群于个人、现实问题于乌托邦可能性”,让美国哲学成为“知识分子对独特的社会和文化危机所做出的回应”,成为“一种文化批评形式”。照此逻辑判断,梭罗当是最具

① Casey, Edward. Foreword. *The Primal Roots of American Philosophy*. By Bruce Wilshire.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0. ix-x, p. ix.

② Mary Poovey 在“Beyond the Current Impasse in Literary Studies”一文中用该词描述当代批评之现状。该文载于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11. 2(1999): 356。梭罗也用“道德怯懦(cowardice)”一词指新英格兰大众的智识和道德状况。见 Carl Bode ed. *Selected Journals of Henry David Thoreau*. New York: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7. 284. 1858年11月6日日记。